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美]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 著

宗教经验种种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尚新建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刘小枫◎主编



宗教经验种种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美]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 著
尚新建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经验种种/(英)詹姆斯著;尚新建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 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 - 7 - 5080 - 4548 - 1

I. 宗… II. ①詹… ②尚… III. 宗教学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6473 号

宗教经验种种

[英]詹姆斯 著

尚新建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 1230 1/32 开

印 张:13.75

字 数:409 千字

定 价:3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于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序 言

xv

假如我不曾有幸应爱丁堡大学之聘,主持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r)^①,讲授自然宗教,恐怕绝不会写这本书^②。因为这一聘任,我必须讲授两门课程,每门十讲;我在寻找这两个讲题时,发觉第一门课可以是描述性的,题为“人的宗教欲望”(Man's Religious Appetite),第二门可以是形上学的,题为“以哲学满足这些欲望”。可是,当我下笔时,一旦涉及心理学问题,内容出乎意料地多;因此,第二个讲题就完全搁置了。现在,这二十讲都是描写人们的宗教性格。在第二十讲,我暗示(并非表述)了我个人的哲学结论;哪位读者想直接了解它们,可以翻看那一讲的最后两大段及本书的后记。我希望将来我能以更明白的方式阐述这些结论。

我相信,与单纯占有抽象公式(不管多么深刻)相比,博识种种特例往往使我们更精明,所以,我这些演讲充满了具体的例证,并且,这些例证都是从宗教性情比较极端的表现中选取来的。因此,有些读者恐怕还没有将书读过一半,就觉得我所提供的是这一主题的讽刺画像。他们会说,这种到了抽搐地步的虔诚,并非正常的心理。不过,假如他们耐心读完这本书,我相信,这种不良的印象将烟消云散。因为在那儿,我把宗教冲动与校正过激行为的常识原则结合起来,让每位读者自己下结论,无论多么温和的结论,完全随其所愿。

xvi

我在撰写这些演讲时得到不少人的帮助,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

① 文献导言应该向詹姆斯请教过,其中的一些细目由詹姆斯选定。1902年7月夏季神学讲座,在题为“宗教中的理智和情感”(Intellect and Feeling in Religion)的演讲中,詹姆斯探讨的问题或许属于形而上学第二教程。在演讲笔记(bms AM 1092.9 [4479])的封面上,詹姆斯注明:“无聊的作品,决不出版。”——译者注

② 威廉·詹姆斯将本书献给他的岳母伊利莎白·普特南·吉本斯(Elizabeth Putnam Gibbens)。——译者注

意:斯坦福大学的斯塔柏克(Edwin D. Starbuck)教授^①,他把广泛搜集的丰富的手写材料让给我;东诺斯菲尔德的蓝金(Henry W. Rankin)^②是我未曾谋面,但经过考验的朋友,我有一些宝贵的信息来源于他;日内瓦的伏卢诺(Theodore Flournoy)^③,牛津的席勒(Canning Schiller)^④,以及我的同事蓝德(Benjamin Rand)^⑤,为我提供了文献;还有同事米勒(Dickinson S. Miller)^⑥和我的一些朋友,纽约的瓦德(Thomas Wren Ward)^⑦、最近住在克拉科的鲁托斯拉甫斯基(Wincenty Lutoslawski)^⑧,都给了我重要的提示和忠告。最后,我对住在基恩谷上格伦莫拉的戴卫森(Thomas Davidson)^⑨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不幸去世,我曾与他谈过话,并利用他的书。

于哈佛大学

1920年3月

① 斯塔柏克教授(1866-1947),美国心理学家,曾执教于哈佛大学。他保存了他给詹姆斯的五封信(bMS AM 1092,信在1023-1027),两封詹姆斯给斯塔柏回信的复制本件(bMS AM 1092.1)。还有《宗教心理学:宗教意识生长的经验研究》(*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Growth of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London: Walter Scott, 1899(WJ 350.83),也有若干本小册子。詹姆斯为《宗教心理学》所写的前言在《宗教和道德》(*Religion and Morality*)一书中重印。该书收入《威廉·詹姆斯著作集》中。——译者注。

② 蓝金是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赫尔蒙男校的图书馆馆长。他与詹姆斯有书信往来,这些信件收入《威廉·詹姆斯书信集》(*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ed. Henry James, 2 vols.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20。其他信件保留在Houghton(*67M-96)。在詹姆斯撰写《宗教经验种种》之前,蓝金曾经为他提供了一些剪报、小册子和书籍。詹姆斯与蓝金的书信往来,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相关资料有关。——译者注

③ 伏卢诺(1854-1920),瑞士心理学家。——译者注

④ 席勒(1846-1937),英国哲学家,詹姆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译者注

⑤ 蓝德(1868-1963),美国哲学文献学家和编纂家,哈佛大学哲学图书馆哲学讲师和图书馆馆长。——译者注

⑥ 米勒(1868-1963),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哲学讲师。——译者注

⑦ 瓦德(出生于1844年),美国银行家,詹姆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朋友。——译者注

⑧ 鲁托斯拉甫斯基(1863-1954),波兰哲学家、作家。在《宗教和道德文集》一书中,詹姆斯提到过与鲁托斯拉甫斯基的关系。詹姆斯也为鲁托斯拉甫斯基的《灵魂世界》(*World of Souls*)一书撰写前言。该前言收入《宗教和道德文集》中。——译者注

⑨ 戴卫森(1840-1900),苏格兰出生的作家,威廉·詹姆斯的密友。——译者注

鸣 谢

本书的翻译最终得以完成,实在仰仗前辈以及许多朋友和同仁的热情帮助。

首先感谢最早将《宗教经验种种》一书译成中文的唐铖先生,尽管先生已仙逝多年。按照原来的计划,此项译事不过是校订唐先生的译作。但由于年代久远,人们的语言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故决定另起炉灶。尽管如此,唐先生的译作仍然是我翻译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参照,无论对理解原文的意义,还是对遣词造句,都有极大帮助。我真正体会到站在前人肩上的感受。

还需要感谢我的同事杜小真教授、姚卫群教授、张志刚教授和孙永平教授。我在翻译过程中曾就理论或文字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向他们求教,他们给予慷慨而热情的帮助。孙永平教授曾对文中一些拉丁文、法文片断和词句的译法提出宝贵建议,他的渊博知识为译文增辉不少,亦使译者受益匪浅。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杜丽燕。多年来,她不仅给我以生活的支撑、精神的享受和情感的共鸣,在学术上亦给予很大帮助。她通读了全书,并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

华夏出版社的编辑王昆君,为编辑此书不辞辛劳,一丝不苟,谨在此致谢。

尚新建
2003 年 11 月

中译者导言

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下文简称《种种》)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美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约翰·斯密(John E. Smith)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

本世纪有关宗教题材的著作,就最初轰动和持续影响而言,没有哪一部能与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相媲美。不过,詹姆斯的成功倒不是因为宗教思想领域后继无人,缺乏旗鼓相当的力作。例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自然与人的命运》(*Nature and Destiny*)以及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存在的勇气》(*Courage to Be*),都曾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著作的范围和影响比较有限。相反,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则关涉一个全球论题——东西方宗教经验的多维层面——他的生动实例加上他的精彩描述,激发了国内外好几代读者的兴趣和想象力。八十年后的今天,《宗教经验种种》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宗教或詹姆斯对所引实例的解释,他所描述的各种经验展示了基本的事实,需要我們思考。^①

如果说,斯密的赞美还局限于宗教思想领域,那么艾迪(James M. Edie)则试图将詹姆斯对宗教经验的探讨与一般的哲学方法联系起来,从更广阔的领域给以肯定。艾迪说:“威廉·詹姆斯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尝试宗教经验现象学的第一人。”而且

① 约翰·斯密(John E. Smith),“Introduction”,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

“到目前为止,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几乎后无来者”。^① 艾迪的意思是说,从现象学发展的历史看,胡塞尔一生对宗教现象不感兴趣。他的后继者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除了梅洛庞蒂偶尔从现象学的观点讨论一些相关问题,其他人根本没有涉足宗教经验。至于宗教哲学领域以略乌(Van Der Leeuw)、爱利雅德(Mircea Eliade)、瓦赫(Joachim Wach)以及奥托(Rudolph Otto)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宗教现象学”,其思想传统沿袭狄尔泰,并非胡塞尔。这个学派的主要工作是运用解释学方法理解宗教典仪、宗教象征、宗教制度,等等,建立若干相对普遍的人类学或社会学形态或类型,以解释历史上的宗教。因而与其称之为“现象学”,倒不如叫“形态学”(morphology)或“类型学”(typology)更贴切。胡塞尔意义上的宗教现象学,确切地说,应该是宗教经验现象学,主要关注宗教经验的内容与活动,揭示它们的本质结构及关系。^② 迄今为止,真正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只有詹姆斯,而且他是独立进行这项工作的,其重要成果就是他的《种种》。当詹姆斯运用新的哲学方法(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尽管那是詹姆斯自己创立的)研究宗教现象时,便对宗教的本质有了全新的理解。

蓝伯斯(David C. Lamberth)在其新著《威廉·詹姆斯与经验的形而上学》(*William Jame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中试图重新评价《种种》。他认为《种种》一书的确是詹姆斯最著名的著作,甚至是美国宗教论著中最杰出的著作。然而,恐怕也正是由于这种宗教主题,致使它成为詹姆斯作品中让人误解最多的一部著作。人们往往从宗教心理学和宗教思想的角度理解这部著作,却忽略了围绕这些宗教经验的哲学问题。^③ 按照蓝伯斯的看法,《种种》一书尽管讨论宗教经验,但其背后隐含着詹姆斯的整个哲学体

① 艾迪(James M. Edie), *William James and Phenomen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2.

② 参见上书, pp. 49-51.

③ 参见蓝伯斯(David C. Lamberth), *William Jame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7-98.

系,即经验的形而上学。《种种》的成功之处恰恰在其深厚的哲学背景,因而应该从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出发加以理解。

不难看出,对詹姆斯的《种种》,人们交口称赞,但并非众口一词。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1)《种种》是一部杰作,因而为众人称道;(2)《种种》并非像有人认为是的那样,通俗易懂,如同一部理论小说,供茶余饭后观赏。诚然,书中确引录大量宗教体验的个案或实例,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但它们同时也那么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让不同人得到不同的理解和收获。因而,尽管都感觉其“伟大”,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并给予不同的评价。或许,《种种》之所以伟大,也是由于她的复杂和神秘。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R. Niebuhr)看到这种复杂性,他说,读者将发现,“《种种》的二十讲和后记设计了一次复杂的冒险,将各种不同的思想线索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张风格独特、魅力无穷的壁毯,而原来的设计方案始终没有完成”。^①

正是由于《种种》伟大而复杂,我们有必要就其结构和内容向中译本读者做一简单介绍,帮助读者理解原著。这是本篇导言的目的。

一、《种种》一书的形成

詹姆斯的《种种》是在吉福德讲演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897年初,几乎同一时间,詹姆斯分别收到爱丁堡大学和阿伯丁大学的邀请,请他主持吉福德讲座,讲授自然宗教。出于各种考虑,詹姆斯拒绝阿伯丁,接受了爱丁堡。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阿伯丁的演讲定在1898-1899年和1899-1900年,比爱丁堡早1-2年(爱丁堡最初的时间安排是1899-1900年和1900-1901年),詹姆斯感觉准备时间过于仓促。主持吉福德讲座在詹姆斯眼里是一种荣耀,因此,他力求完美无瑕。他在给弟弟亨利(Henry)的信中说:“我必须竭尽全力,这个题目基本在我学校授课的范围之外,我

^① 尼布尔(Richard R. Niebuhr),“William James on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James*, edited by Ruth Anna Put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14-5.

需要一个较长的空闲时间进行研究。”^①

事实上,宗教问题对詹姆斯来说并不陌生,除了他家庭的宗教背景外,他本人亦经历过宗教与科学的生死搏斗,致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都渗透着深刻的宗教关怀。^② 只不过长期的教学和心理学研究,使他无暇整理自己的宗教思想。1882年他父亲去世,使他萌发这一心愿。用培里(Ralph B. Perry)的话说,《种种》是詹姆斯尽孝道(filial piety)的结果。^③ 老亨利去世不久,詹姆斯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今后你有一个新的功能,或者,与其说是新功能,倒不如说是老功能重新理智化:你必须承担责任,让我更多地理解一点儿父亲意义上的宗教对人的心灵生活和命运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按照父亲的说法,这并非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我的朋友完全忽略了它。我作为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别的理由的话),必须帮助他们在他们心目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因为这个缘故,我必须学会正确地解释它,你必须帮助我。”^④吉福德讲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为了准备吉福德讲座,詹姆斯投入大量精力:写信给友人,搜集宗教经验方面的传记材料,讨论宗教问题,阅读相关资料。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得到包括斯塔伯克教授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有幸接触到许多有关宗教经验方面的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他逐渐形成第一个讲演的初步计划。他在1898年10月19日兴奋地对妻子说:“我对第一个吉福德讲演已经有了好的想法;因此我认为,计划现在开始明晰起来。”^⑤

① 转引自哈佛大学版《种种》编者文章:“The Text of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21.

② 参见拙著:《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 参见培里(Ralph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5, p. 323.

④ 参见培里(Ralph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5, p. 323.

⑤ 转引自哈佛大学版《种种》编者文章:“The Text of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24.

然而,准备工作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由于教学和其他工作干扰,研究时断时续,有时甚至根本无暇顾及。他时常抱怨说:“这些日子,阅读几乎毫无进展,干扰太多,浪费了时间。”“一个月来,我没有机会读一行有关吉福德讲座的资料。现在看来,我必须整个夏天泡在剑桥,弄出我的第一门课程来。”^①1899年5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詹姆斯因心脏病需要出国疗养。他坚持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备课,但进展缓慢。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阅读和写作几乎都是在床上进行的,一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全无改善。或许是因祸得福,爱丁堡方面考虑到詹姆斯的健康,将其演讲时间推迟一年。这为詹姆斯赢得一些时间备课,当然,他同时也要与病魔作斗争(有一个时期詹姆斯病情严重,他曾向爱丁堡提出辞呈,但爱丁堡方面不准,并允许他的演讲可无限期推迟)。

1900年9月,詹姆斯给爱丁堡的朋友塞斯(Andrew Seth Pringle-Pattison)写信,通报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准备演讲的进展情况。他在信中称第一门课程基本成形,前四讲已经完稿,其他六讲资料齐备,腹稿成熟,可随时喷涌而出。他随信寄去课程的大纲:^②

1. 宗教是“神经病”吗?
2. 宗教是“残存物”吗?
3. 看不见之物的实在
4. 一次生,健康心灵的态度
5. 病态心灵
6. 异样人格,二次生与救赎
7. 新生、皈依,等等
8. 圣洁、苦行,等等
9. 神秘主义与信仰
10. 结果

如果将这份提纲与《种种》的目录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二者极

① 同上书, pp. 524, 535.

② 同上书, pp. 534-535.

其相似,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扩充。事实的确如此,詹姆斯在《种种》的序言里已经明确指出,他原来构想的吉福德讲演有两门课,两个讲题,第一个讲题是描述性的,题为“人的宗教欲望”(Man's Religious Appetite),第二个讲题是形上学的,题为“以哲学满足这些欲望”。然而当他下笔时,“一旦涉及心理学问题,内容出乎意料地多;因此,第二个讲题就完全搁置了。现在,这二十讲都是描写人们的宗教性格”。^①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詹姆斯最终没能写出第二个讲题,但是他对这一讲题情有独钟。他曾写信给友人介绍他的两门课程,称“第一门课是对‘各种宗教经验’的客观研究,第二门课是我的夙愿和遗嘱,阐述最符合一般宗教需求的哲学”。^②后来人们在詹姆斯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第二门课的大纲,写作日期不详。笔记本记有“宗教经验种种”和“宗教哲学的任务”两大标题,后一标题下的内容如下:^③

1. 统一的神化
2. 从实用的角度考虑它的各种意义
3. 邻接的个案,毗邻及其作为终极关系的辩解
4. 消解于亲密的投射(eject)
5. 认知关系
6. 驳倒布拉德雷(Bradley)
7. 驳倒罗伊斯(Royce)
8. 解释实用主义
9. 取代-结局
10. 进化

这里已经进入詹姆斯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哲学,完全是抽象理论。按照詹姆斯的构想,两门课程一个侧重素材,一个侧重

①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907, Preface.

② James to Miss Frances R. Morse, Dec. 23, 1899, in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 II, p. 112.

③ 转引自哈佛大学版《种种》附录 IV,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93.

理论；一个描写，一个论辩，交相辉映，彼此补充，珠联璧合，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向听众介绍他的宗教观。遗憾的是，由于健康原因，此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好在每门课程相对独立，各自的内容和逻辑均完整无缺，自圆其说。在友人的建议下，他扩充第一讲题，放弃第二讲题。

詹姆斯的吉福德讲座终于在1901年5月16日开讲。初次讲演取得圆满成功，无论出席人数还是听众的兴趣，都出人意料。他在给弟弟亨利的信里描述了这一天讲演的情景：

天气晴朗，听众有两三百人，挤满了屋子——似乎比预料的要多。在办公室与六七位教授和主持人缪尔(Muir)会面，我们穿上礼袍，随一个执权标的领队者，穿过院子走进讲演厅。据爱丽丝(Alice)^①和H讲，一时间，学生们(约占听众的1/3)吹口哨、唱歌、跺脚。缪尔向听众介绍我，结结巴巴，趑趄趑趄。我站起来，开始宣读我的材料。听众精力集中，心领神会，最后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总之，生米已经下锅，严寒已经过去，热烈的反应已经开始产生。^②

讲演的成功使詹姆斯精神大振，一扫长期病患带来的抑郁情绪，随后的讲演自然进展顺利。全部讲演分两段，分别在1901年春和1902年春进行。1902年6月9日詹姆斯写道：“最后一讲今天结束，——约四百听众，鸦雀无声，聚精会神，热情洋溢，直到终场。然而，一切都结束了，我是多么高兴啊！”^③

詹姆斯在准备讲演稿时，已经有了出版的计划。很快，书稿付梓刊印，出版发行，并立刻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詹姆斯告诉友人：

……书卖得出奇好，因为一本只卖3元多。现在已经印了10000册。我收到许多陌生人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函。评论者无一例外，都用了“不满足”(unsatisfactory)这个词，以抚慰自己的良

① 爱丽丝，詹姆斯的妻子。——译者注

② 转引自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 540.

③ 转引自培里(Ralph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5, p. 326.

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我抱以同情和赞许。^①

《种种》的初版是1902年6月,8月第二次印刷,有所修订,随即多次重印。据统计,第一版问世后50年,重印40次,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印刷,共达56次,还不算国外的各种译本。^②

《种种》的第一版也是最流行的版本,由 Longmans, Green & Co. 出版,曾为学术界广泛运用。198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种种》,将其列入哈佛版的“威廉·詹姆斯著作集”第15卷。这一版本在文本上并无多大变化,但编者对文本做了历史考证,不仅在长文“《宗教经验种种》的文本”中详述文本的形成过程,而且增加了若干附录,将詹姆斯文献档案中有关《种种》的部分草稿、笔记和书信公之于众。编者还对文本增加了一些编者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这是《种种》目前最好的学术版。不过,该书的文字印刷错误稍多。

二、《种种》的思想内容

1. 《种种》的写作意图

《种种》有一个副标题:“人性的研究”(A Study in Human Nature),常常为人忽略。然而,它对理解詹姆斯的写作意图,深入领会文本的意义,都至关重要。詹姆斯在致友人莫斯(Frances Morse)的一封信里谈及《种种》的主题,他说:

我给自己设定的问题很难:第一,捍卫(一反我的“阶级”偏见)“经验”,反对将“哲学”作为世界宗教生活的支柱——我的意思指祈祷、引导,以及所有私人直接感受到的那类东西,反对对我们的命运和世界的意义持高贵的、普遍的观点;第二,使听众和读

① 转引自培里(Ralph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5, p. 326.

② 参见约翰·斯密(John E. Smith), “Introduction”,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i.

者相信我自己坚信不疑的东西,即,尽管宗教的所有特殊宣示都是荒谬的(我指它的教义和理论),然而,整个宗教生活却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能。恐怕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可能将失败;但是,尝试它是我的宗教行为。^①

詹姆斯这里所说的第二点似乎给出了人性研究的结论:“宗教生活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能。”将宗教生活与人性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宗教生活的层面发掘人性的秘密,这正是詹姆斯《种种》的目的和特点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人性、发掘人性、揭示人性是詹姆斯整个学术生涯的使命。他早年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结果发现这些学科仅局限于人的肉体,触及不到人的灵魂。因而,他转向心理学研究。他借助心理学手段分析意识的不同层面,发现了规定个体自我的经验之流(意识流)。然而这个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意识的结构,揭示意识流的基本特征,阐释意识的各种机能,尚无暇顾及道德与宗教的层面。直至19世纪90年代,他才逐渐转向这些领域。詹姆斯知道,只有超出普通心理学领域,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人的自由、审美、道德、宗教等各个层面,才能深入理解人性。詹姆斯的《种种》将宗教生活与人性联系起来,正是他的学术历程的一个必然结果。

詹姆斯的结论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是发聋振聩的呐喊。自笛卡尔创立近代哲学之后,人们愈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也就是说,从理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性。其结果不仅是相信理性至上,将理性看作人的本质,而且将理性规则等同于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从而将人变成“科学”的人:“生物人”或“物质人”。拉美特利(La Mettrie)“人是机器”的论断就是这种趋势的极端代表。在他眼里,人的一切机能,包括人的灵魂,都服从物质的运动规则,与机器并无差别。固然,人有自身的特殊需求,也有满足这种需求的各种能力,但这种需求和能力都取决于他的身体结构。人的本质如此,人的其他

^① James to Miss Frances R. Morse, Apr. 12, 1900, in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 II, p. 127